

陷阱：真的应该“废止语言”吗？——韩少功《暗示》质疑兼及汉语写作的困境

发布日期: 2007年10月18日 点击次数: 1204

陷阱：真的应该“废止语言”吗？
——韩少功《暗示》质疑兼及汉语写作的困境

贺 昌

(南京大学中文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韩少功的《暗示》提取的是种种非语言状态下生存境况的具“象”图景，他试图避开语词的言说，以便仔细翻查那些存在于语言之外的生动图像的具体涵义，这是《暗示》能得以展开叙述和阐发的基本前提。《暗示》所提供的“具象”材料大致分为这样三类：一是韩少功对自身所观察到的当下的事实经验的阐发和分析；二是对既有的“文革”经验和一般现象的回顾与剖析；三是借助西方新的语言学及哲学的理论资源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言象之辨”所作的现代阐释。这三者均统一在“体悟言说之外的生存底蕴”这样一个核心主题之上。韩少功似乎坚定不移地认为，语言之外的东西一定比语言所传达的东西更为真实。本文对此一问题提出了质疑，并认为，汉民族既有的国民精神境况非但不能“废止语言”，反而需要建立起真正的“语言”言说体式，由此才能确立起真正的“理性”。

关键词：语言；理性；废止

中图分类号： I044 **文献标识码：** A

《暗示》自去年出版至今，已经有相当多的评论对韩少功的这一新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不少报刊都是以成组的笔谈形式对《暗示》一书展开讨论的，但细读这些笔谈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文章，笔者发现，评论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韩少功的“废止语言”的主张表示了完全的赞同——即使是反对《暗示》的基本思想立场及道德倾向性的人也是如此。笔者在此就不一一列举那些虽表述各异但差别不大的种种意见了，而只想就“是否应该废止语言”的问题提出一点疑问，借以求教于诸君。

毫无疑问，《暗示》是一本谈论有关“语言”问题的书。或者说，它是一位小说家对于一系列“语言事件”的描述和思考，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关于“语言”的故事。至于它到底算不算是一本小说，我想，这个问题跟《马桥词典》一样并不重要。

韩少功对于“语言”问题的痴迷是由来已久的了，从《爸爸》中丙崽的“失语”，到精心收集马桥人的“杂语”，再到这本《暗示》对于“语言”的彻底删除——“无语”。回想一下，差不多凡是有着“寻根”倾向的作家，都对“语言”本身怀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迷恋，或者恐惧。也许只有那些深爱着或者深恶着语言的人，才会显露出这种独有的特征——要么占有，要么抛弃；如果既不能占有也不能抛弃，那么，彼此之间就只能展开无尽的厮杀了。

但是很遗憾，我们的作家们总是容易被自己的眼睛所迷惑，他们始终都没有弄明白，那个挂着“语言”的面具，披着“语言”的外衣正在四处游荡的对手，其实是“言语”，而不是“语言”本身。我得事先声明，我无意于去纠缠这些概念在理论上的区别和联系，我只想说明的是，我们在谈论“语言”问题或者是在叙述“语言”故事的时候，最好对“语言”本身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因为把一只披着羊皮的“狼”错误地看成是“羊”，其结果无疑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知道，人类是出于自身表达与彼此沟通的需要才有了语言的。人们只有共同约定把某个东西命名为“石头”，才会在有人需要“石头”的时候别人不至于给他拿根“木棍”来。所以，语言一直显示着某种“契约”的特征，这是由它的本性——语言的“统一性”所规定的。有了这种统一的“语言”的规定，才会使那些各个不同的“言语”能够遵从同样的规则，并用以约束“说”的行为，而不至于各“说”其事。也只有如此，才能构筑起真正的理性基石。西方人对于“语言”本身的重视，几乎体现在他们生存的方方面面。小到手按《圣经》的起誓仪式，或各式律令条文的细则（较低层次的统一性），大到对于“逻各斯（Logos）”的膜拜和遵从（最高级别的统一性），而每一个层次的统一性都将受到更高层

次统一性的约束。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才称“语言是存在之家”。离开了作为统一性规定的“语言”，“言语”之间就会不断发生冲突，甚至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但由于长期以来，这种层层约定的“logos”规范日益走向了仪式化（教条化），并最终导致了人的理性的机械化（工具化），所以才出现了强烈要求去除“logos中心”之钳制（解构）的呼声，也由此才出现了西方思想史上语言哲学（审视语言本身）的转向。这是一个谈论“语言”问题的最基本的背景，假使我们能够把这个背景作为讨论的必要前提的话，照理说，是不会出现那种似是而非的令人吃惊的混乱的。

现在考察一下汉语的基本情形。严格地讲，汉语不能算是一种精确的语言，致力于汉语言研究的人大多会感觉到这一点，即使现行的这种经历过西化洗礼的现代汉语也仍然充满了模糊性和随意性，因为它的内核依然秉承着既有汉语的本性。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不可杀人”，作为一种最高统一性的“语言”规定，它的内涵是指“你没有取消他人生命之存在的权利”，只有把一切的“人”都包括在内，这个一般性的“言语”才可能上升为真正的统一性的“语言”；而在汉语语境中，它并不是这样的，“你不可杀人”常常只是意味着“你不可杀好人”——“杀掉坏人”则是被允许的。这说明“你不可杀人”并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约定，它只是一种有着弹性的“说法”，这种“弹性”有意无意地将“坏人”排除在“人”之外。所以，汉语中的“你不可杀人”仍然仅仅停留在“言语”层次上（可以各“说”其说），而未能成为真正的“语言”——至少未能形成那种作为最高统一性存在的“语言”。类似的可左可右的“言语”实例在汉语中比比皆是。

据韩少功自己说，《暗示》主要是针对《马桥词典》而写的，如果说《马桥》所剖析的是被语言遮蔽的生活真相的话，那么《暗示》所提取的则是非语言状态下生存境况的具“象”图景。也就是说，韩少功试图避开语词的言说，以便仔细翻查一下那些存在于语言之外的生动图像的具体涵义，这是《暗示》能得以展开叙述和阐发的基本前提。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言说”面前，他宁可选择沉默，“沉默不仅仅是语言的慎用，而且是彻底的删除。”（P2）

那么，删除了语言以后的情形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观呢？我们不妨把《暗示》所提供的“具象”材料大致分为这样三类：一是韩少功对自身所观察到的当下的事实经验的阐发和分析；二是对既有的“文革”经验和一般现象的回顾与剖析；三是借助西方新的语言学及哲学的理论资源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言象之辨”所作的现代阐释。这三者均统一在“体悟言说之外的生存底蕴”这样一个核心主题之上。韩少功似乎坚定不移地认为，语言之外的东西一定比语言所传达的东西更为真实。

先看第一类材料。这一类材料所描述的差不多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着的现存事实。比如“骨感美人”，一种新的“无性化审美”趋向；或者“高位模仿”，那种潜在地暗示着趣味与财富分配关系的隐秘信息。“新新人类”，尽管刻意地从装束和行为上将自己跟这个世界区别开来，但犯了规矩遇上警察照样涕泪长流一塌糊涂，无他，“性相近而习相远也”，其本性并没有改变；女人热中于逛大街泡超市，也仅仅只是因为商品的丰富能暗示出生活的种种可能性甚至所谓“幸福”的方向；“无厘头”电影的搞笑与疯傻，颠覆了逻辑同时也就嘲弄了“语言”，“笑也许还涉嫌幽默，还涉嫌知识、理解、意义之类过时的罪恶，疯则是笑的彻底平面化和即时化，只是纯粹声色的爆炸，与语言逻辑彻底诀别。”（P120）此外还有充斥于大街小巷的“卡拉OK”，画面与歌词严重错位但人们照样唱得声嘶力竭亢奋无比，这无疑是在糟蹋我们“有限而可贵的道德资源”（P202）！？电视剧更是这种卡拉OK情节化之后的垃圾产物。包括不知所云或者即使知其所云最终还是要上当的广告；以及虚假的应酬，恰到好处的讪笑，空洞的都市情结，挥之不去的怀旧冲动，甚至包括结婚证明重要还是婚礼仪式重要，是“说”出“我爱你”重要还是什么都不说直接吻你重要，如此等等。这是每天都正在发生的生活事件，是每天都在扩大繁殖的符号垃圾，但这就是最实在的现实，你根本就没有选择或逃避的余地。为什么会这样呢？韩少功把问题的答案指向了“语言”。或者更准确地说，指向了语言所生成的符号暴力。语言引导着人们的欲望和感觉，而语言背后所透露出来的隐秘信息则完全被人们忽略掉了。套用昆德拉的话说，人们正迷失（或陶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当中，虚幻的感觉正在扩大而生命的意义正在消失。这种思考的向路跟众多的学者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人类生存困境的焦虑是一致的。其基本理路是：理性走向了工具化，根因在于作为最高语言形式的“logos”已经成为了僵死的教条，并由此形成了以“logos”为中心的层层递进的“本体论”堡垒；要想阻止理性的工具化就首先必须打碎（解构）“logos”中心；而要打碎它，最为便捷的途径就是无限释放丰富的感性能量——但是，释放这种能量犹如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其后果就是人类获得了巨大的感觉狂欢却再也找不到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这的确是一个悖论。韩少功在考察

过这一系列的现象之后，似乎寻找到了一个可资参考的答案：破除语言的迷信以便看清语言背后的真相。“骨感美人”的背后是对身体的戕害；“卡拉OK”的背后是对美感的糟蹋；《红太阳》歌碟的再度流行不过是为了怀旧而与一切政治意识形态无关；连为纳粹演奏过贝多芬的富特文格勒不是也有饱含泪花的时候吗？

语言之外的感性世界确实丰富无比，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显示着生命的真义，但韩少功这里所揭示的一系列现象似乎跟“语言”本身无关。假如我们承认作为最高统一性的“语言”是规定理性之所以能成为理性的根本前提的话，那么，实际的情形也许正好相反，并不一定是“语言”在引导人们去戕害身体，去篡改歌词，或者一见到《红太阳》就想起“文革”，一听说富特文格勒或卡拉扬就想起了纳粹。这恰好证明了一切混乱和谬见的根源正在于人们放弃了真正的“理性”，而正在跟着那些披着“理性”外衣的“伪观念”瞎跑。真正的“理性”是指“人都有不断地自我反思的能力”，这种能力立足的基础就是由语言的统一性所确立起来的“协约”，比如对“美”的一般性的规定，对意识形态边界的规定，对于“正义”的规定，甚至对于“语言”自身的规定（语言法规）。“破除语言迷信”在此应当是指破除那些肆意糟蹋语言本性的放任和自大，而绝不能是“废止语言”；应当是细心而具体地去审视和清理那些语言的衍生垃圾，而不是去责问“语言”本身的罪过——人们恰恰应当反问一下自己，在遗弃了“语言”之后人们究竟得到了什么。韩少功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些现象背后的问题，但不能说他为这些问题寻找到了答案。

关于“文革”经验，事实上也完全可以看作是《马桥词典》的某种延伸，因为韩少功在《马桥》中除了阐发那些“语词”的特定意指之外，他同样也在“暗示”那些“语词”之外的“具象”的真正涵义（能指与所指的滑动或转移）。《暗示》中的“文革”故事主要集中在记忆中的“太平墟”这样一个时空中。有官越作越大脾气越来越暴戾但乡情味儿却越来越重的四满书记，有相信文字证据而导致了父亲的自杀却不相信有关父亲“好色”的谩言的高君；老木因军装受辱结果终生养成了对军装的癖爱，跟人结义却不喝鸡血酒差点和武妹子反目成仇；与时下的“高位模仿”相反，插队讲究“低位模仿”，要养成农民式的抽烟习惯，要听懂并学会各种粗痞话，要刻意把干净衣服弄脏，女性必须以“铁姑娘”的标准范式隐藏起自己的性别特征（“无性化”的整体氛围），“文化阉割导向政治绝育”（P32）。还有那些以“闹剧”方式来嘲弄“语言”的场景和画面，比如严肃的样板戏舞台上孩子们奔跑打闹的嬉戏声，婚礼招待会上的“默片”，脚下跳着“忠字舞”心里却想着漂亮姑娘而荡漾在脸上的欢愉，等等。这类事件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批判与《马桥词典》中对“马桥生活”的观照是基本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在这类事件背后，韩少功更愿意强调一种“无语”的力量，或者说一种“默契”与“和谐”，就像农民建房时的就地取材与恰到好处。“梁山好汉”式的江哥（江毕成）能济人于危难，原因不在于“说”了什么而仅仅是从一双回力牌球鞋上看出了大家是朋友，是“自己人”；人们并不在乎大川作为领袖的魄力和见识，但却非常在乎落在他身边的来历不明的避孕套；法官也可以不在乎大头是不是该定为小偷，因为他偷的不过是“书”，尽管这些书的价值可能超过百万。其他包括民居的古朴，村落的安闲，家园的温馨，俄罗斯民歌的韵味，甚至那种久别了的令人无限怀恋的诗意的月光。这一切无不透露出韩少功对于某种亲和之情的执着与向往。说得更明白一点，在这里，基本的“人情味”比任何“语词”所传达的内容都要丰富和重要得多。相信文字，你会看到伟人的劣迹，它也许就永久地破坏了伟人在你心目中的形象；相信“革命”（话语）就会失去狂欢；相信“法理”就会被判刑；相信嘴巴里说出来的“话”就会忽略墨镜背后眼神里的狡黠和欺诈；而相信了都市的“神话传说”无疑也就遗弃了乡村月色的诗意与缠绵。

正像韩少功对于当下生活境遇的解读一样，贯穿于“文革”经验的叙述之始终的仍然是语言——准确地说是“话语”——与“情境”的对峙。他愿意寻找某种“默契”，“‘默’即是语言的放弃。”“最成熟的关系其实不需要语言，不需要交谈。”（P22）因为当“性格与观念两相剥离的时候，性格常常表现为一种身体语言，表现为‘怎么做’而不是‘做什么’，或者说通过‘怎么做’来隐秘地‘做什么’。”（151）换句话说，很多事实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理由，因为它本身是“自明”的。这一点当然应该得到肯定，比如“自然”是“自在”的，因而是“自明”的；人类的基本情感也是“自在”的，它同样应当是“自明”的。但这里的“自明之物”并不能把一切“言说”之外的信息全部都包容尽净，也就是说，很多貌似“自明”的事件实际上正被这种“自明”本身遮蔽着，它所展示的并不一定就是事实的本相。你能说由于贪污而进了大狱的四满书记，其骄横跋扈不过是假相而恋乡情结才是真相吗？能说被周麻子故意加刑的江毕成，从天车上摔死周麻子不能算是他的本相，而追求江湖道义才是他的本色面目吗？作为事实判断，它们都是真实的事件，他们的行为也都不是由“语言”去指使的——这里恰好暴露出“语言”的缺失，或者说“理性”的缺席。当行为

完全由感觉去操纵时，灾难也就会随之而降临。美国人拒绝由富特文格勒指挥在美国的大地上演奏贝多芬，这不仅仅是在拒绝或反对纳粹，它实际上是在维护一种起码的人类“正义”。阿多诺提出“奥斯维辛之后”的命题，也并不仅仅停留在德国人的忏悔问题上，因为“奥斯维辛”的事实告诉我们，对“人”犯下罪行的恰恰是“人”本身，而不只是纳粹。同样的道理，“文革”中由“人”所犯下的罪行并不能仅仅由具体的某个人承担，而必须由所有的人去承担和反思。这种承担绝不能由某种貌似合法的道德正义性所取代，更不能以受害人本身的道德缺失或者自己同样受到了更大的伤害等等为理由而“拒绝忏悔”。因为这是“人”本身的最基本的责任，表面“自明”的意识形态批判常常遮蔽着人的逃避责任的事实，正像表面“自明”的乡村景观往往掩盖着愚昧落后的反文明色彩一样。人们如果愿意沉迷在能“骂”出具体形象的赣三爹的“毒嘴”的“巫魅”快感之中，那恐怕比现代都市文明的堕落更为糟糕。

《暗示》执着于审查“具象”，但有时却难免寻错了罪因。从《暗示》所提供的理论材料来看，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有关“言象之辨”的讨论和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许多基本命题，可以看作是《暗示》的阐述能得以立足和展开的根基性的依据了。在“言”、“象”之间，韩少功倾向于取“象”而舍“言”，这与古人所谓“得鱼而忘筌”、“得象而忘言”的理想是基本一致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镜中之象，水中之月”、“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兴味”、“意象”、“滋味”、“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但我总觉得，中国古人所强调的“废止语言”，跟现代西方哲学所讨论的“警惕语言的陷阱”应该是两码事儿。换句话说，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从来都没有确立过真正“语言”的地位，不管是历朝明君昏君，还是往来的先圣后哲，对“语言”本身无不持一种鄙视的态度。不用说“道可道非常道”之类的玄想，或者“当头棒喝”、“醍醐灌顶”一类的觉悟，连为后世君子确立了“仁”的规范的孔子，对“仁”的定义也常常是模棱两可的。“语言”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从未被当作人与世界本体之间的必经的“中介”，当然就更谈不上将“语言”本身及其逻辑形式当作本体或客观规律了。否弃“语言”也就否弃了对于最高统一性的追求，当人们强调“名”与“实”相“符合”的时候，“名”就只能附着在“实”之上，而无法获得一种独立的地位。由此形成的理性就只能是“实”的、可“用”的，这种统一性比“名”的统一性要低并且不受“名”的制约，所以就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推导：凡是实用的就是合理的。推翻一个王朝是实用的因此是合理的，杀掉一个坏人是实用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同样的，与其加入到人世纷争之中不如退回到自然的谐和，这也是实用的所以是合理的。中国人可以装神弄鬼以取得战争的胜利，但绝不会以“神”的名义去发动一场战争；梁山好汉杀人如麻，但只要杀的是贪官污吏就会大快人心；“文革”中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的只要确实是道德败坏品质不端之人，就没有什么值得人愧疚的地方。这说明中国文化本身就一直潜藏着某种根本性的缺陷，这些东西也正是需要我们警惕和进一步深入反思的所在。西方人反思“语言”，是因为由他们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那个“Logos”体系本身出了毛病，这类毛病随着文化的交融和渗透，对于我们当下的生存也的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对于我们这个并未确立过“语言”的真正地位的民族来说，这类问题的根本原因恐怕不能说也是由于“语言”的缘故。更何况，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维特根斯坦，甚至是福柯，都从来没有说过要“废止语言”，而是强调对于“语言”，尤其是对于“语言”的运用（以语言所作出的判断）必须万分警惕。“慎用语言”的前提仍然是对于“语言”的尊重，而不能是蔑视甚至“删除”。从这个角度来看，韩少功称：“中国古代学者们基于‘天人合一’、‘尽性穷理’的终极抱负对语言展开清理，一心追究事物是否可能被言说，看语言是否构成了自身的牢笼，大概不失为一种意在心智反省的语言哲学——其抱负之远大又不能不令人感叹和惊羨。”（P348）这样说恐怕就混淆了中西“语言”问题的界限了，并且离福柯清理语言的基本思路也会越来越远。

舍“言”而取“象”，跟韩少功对于民间“人情味”的强调有着某种潜在的联系，这里所透露的正是一种亲情重于理法，实用重于公理的文化选择。所以，西方人动辄因为一件小事情而把对方告上法庭，甚至敢于把自己的父母告上法庭，这类事件在中国人看来就有点不可思议了。中国人历来讲求“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世界与世界的和谐，甚至包括物与物之间的和谐，但这种“和谐”常常是“自在”的，它并不以某种“协议”为依据，所以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某种截然相对立的东西也可能会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他可能无比真诚地对待一个人而转过身去就可能把媚笑献给另一个人，可能一边唱“从来没有救世主”一边也同时在喊“人民的大救星”，连某种虚伪都有可能也是真诚的。“相安无事”、“和气生财”不过是维护“和谐”的藉口，这种情形曾被鲁迅指为“几乎无事的悲剧”，其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瞒和骗”——由“自欺”既而“欺人”。民众

满足于日常生活的忙碌碌碌，他们不会觉得自己的这种的生活方式跟人类的整体文明有多大距离，或者会有什么可悲之处；知青们愿意将插队生活的回忆当作自己怀旧的资本，愿意用《红太阳》把自己拉回到既往的情境中，他们也未曾想过自己的生命被无情地戏弄了一番，这种事情该有多么的荒唐。法官并不认为大头偷书是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慷慨地放过了他，人们会觉得这很有“人情味”，而从来不会想到这其实是对法律尊严的蔑视，是以所谓“人情味”在掩盖“瞒和骗”的真相；江哥即使杀了人，人们仍然会觉得他很仗义因而有“人情味”，却绝不会去想这里面恰恰隐藏着动物性的凶残本性；沈从文笔下的湘地即使血流成河，人们也愿意认定沈从文是想藉苗人的强悍来弥补汉民族的孱弱和所谓的“文明”的虚无。同样的，文人墨客们将“融入自然”当作生存的最高境界，在所谓“诗意”的陶醉中流连忘返，他们也从不会想到自己其实不过是在暂时逃避现世的苦难，而一有机会自己照样会力求飞黄腾达的。“人”把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这是人类文明的开端，自然从此成了“人”的对象物，即使讲“回归自然”也是在强调彼此之间的协调“共处”，而绝不是取消“人”的独立性而把“人”重新拉会到“自然人”的原生状态去。这跟中国古人的那种放弃“自我”退回到原始的自然形态以换取某种“诗意”有着截然的差别，更与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居”一点都不相干，因为海氏强调的“诗意”是指沉浸在“思”之中的“诗”一般的状态，而绝不是自我迷失。

韩少功在非难了“语言”的种种罪过之后，让自己落脚在了“诗意”和“人情”之上，这不能不令人产生某种怀疑。当西方的所谓“文明化”落入到如此境地，或者当国人的生存混乱到如此境地之时，“忘言”的“诗意”和温暖的“人情”式的东方智慧真的能挽人类狂澜于危境吗？在他看来，仓颉造字之际，“天雨粟，鬼夜哭”（P3），早就“暗示”出了文字的出现是不祥之物，如果这不是“巫魅”，那实在就证明了我们祖宗之见识的非凡。所以，自古以来，“纹”比“文”要重要得多，“文明”的本相就该是以“纹”而“明”。孟子“说”了那么多，却远远不及他眼神里的“浩然之气”更能铭记于人心。器物的精神感染也远胜于意识的陶冶，因为它更具“影”响力量。墨子的“非乐”与“节用”的平民立场和役夫形象无疑是对荀子之所谓“仪礼就是权威”的极大嘲讽，英迪拉·甘地不也正是以其绝对苦行的“形象”在昭示着一种精神力量的伟大吗？“精神常常是对物质可见状态的反应。”（84），历史也不过是财富的位移。蛮族的“夷语”（符号崇拜）和太平墟的“野言”（形象感）也许正饱涵了对于“文治”形态的反叛。相对于“语言”的刻板、教条、形式化，甚至经常被文化或意识形态当作妓女来玩弄的情形而言，一切的影象、“色”、“识”、场景、面容、声调、仪式等等，都要比“语言”来得实在而鲜活得多。总之，现代人的堕落归根到底是上了“语言”的大当，只有去“文”重“象”才能恢复人的本来面目，“肉身的死亡，或是感觉的死亡，‘这是一个问题’。”（144）

如果真是这样，这本《暗示》可算是解决了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

但是很遗憾，当我们把问题逐一罗列出来以后，我们恰恰发现，韩少功并没有超越于问题之上，却正好把自己纠缠在了问题之中。想突围但被理也理不清楚的各种藤萝缚住了手脚，想借助“语言”来展开“言说”（比如本书在文体突破方面的尝试），却又在自己既有的对于“语言”的怨愤面前不得不停止了脚步。就像附录在书尾的那一大堆被打上了中英文标记的思想家们那样，彼此争吵而又龃龉不清，是应该反对语言崇拜呢？还是应当让那个“sein”自行“De-sein”起来？要“生存”还是要“语言”？是“删除语言”还是“删除存在”……。昆德拉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有个捷克人，想申请移民签证，官员问：“你打算到哪里去？”“哪儿都行！”他说。官员给了他一个地球仪：“自己挑吧！”他看了看，慢慢转了转，对官员说道：“你还有没有别的地球仪？”假使我们明白，生存本身就是“悖论性”的，我们也许就会放弃那种试图一揽子解决问题的虚妄想法了。因为“悖论”不是“矛盾”，“矛盾”是可以解决（或转化）的，但“悖论”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可资解决的方案，这就是真正的生存的“本相”。而要看清楚这一点，我们也许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外部世界的刻意审查上了。唯一可做的，也许只能是返回并面对自身，从肉身的体察和感悟中生成出真正的“语言”之“花”来。

The Trap: Truly Should ‘Abolish Language’

—— query to Han Shao-gong’s Hint and the Plight of Chinese Writing

He Chang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Abstract: Hint by Han Shao-gong extract various concrete images of living

conditions in a state of non-language, he try to evade the speaking of words, in order to carefully examine concrete implications of vivid images which beyond the language, this indeed the basic premise to expand narration and to elucidate. 'concrete images' in Hint largely are sorted into three: elucidation and analysis of observed facts at present; review and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 and common phenomena; modern exposur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peech and image' in China's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this can be done by the virtue of new western linguistics and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philosophy. The three unite into the center theme: 'appreciate living implications beyond speech'. Han Shao-gong seems to firmly consider: what beyond language are truer than what conveyed by it. The thesis raise a query to the question, and think that, the people's spiritual state of the Han nationality, not to 'abolish language', rather, need to establish true speaking style of 'language', thus, the true 'ration' only can be establish.

Key words: language; ration; abolish

[上一篇>>两部史著与一个话题——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跨学科思考](#)

[下一篇>>诗之思的断裂与延伸——重读《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导、序言”](#)

[【 关闭本页 】](#)